

Classical Economics

[美] 默瑞·N. 罗斯巴德 / 著
张凤林 等 / 译



古典经济学

奥地利学派视角下的经济思想史（第二卷）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古典经济学

——奥地利学派视角下的经济思想史(第二卷)

[美]默瑞·N. 罗斯巴德 著

张凤林 等译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2012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古典经济学:奥地利学派视角下的经济思想史.
第2卷/(美)罗斯巴德著;张凤林等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2012

ISBN 978-7-100-08848-0

I. ①古… II. ①罗…②张… III. ①古典经济学
IV. ①F091.3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282687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古典经济学

——奥地利学派视角下的经济思想史(第二卷)

[美]默瑞·N. 罗斯巴德 著

张凤林 等译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100710)

商务印书馆发行

北京市白帆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ISBN 978-7-100-08848-0

2012年10月第1版 开本 850×1168 1/32

2012年10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张 29

定价: 68.00元

导 言

正如本书的副标题所表明的那样,这是一部根据明确的“奥地利的”立场,亦即经济学中的“奥地利学派”拥护者的观点而撰写的经济思想通史。它是由现代奥地利学者所完成的唯一一部此类著作,实际上,近几十年来,奥地利学者仅仅出版了少数几种有关思想史这一专门领域的专题论著。¹不仅如此,这种观点还是建立在“米塞斯学说”或“人类行为学”(praxeologic)的基础之上的,而这种学说在当前已成为奥地利学派中最不时兴(虽然并不是人数最少)的一个演变分支。²

但是,本书的奥地利学派性质还不是它的唯一特色。当本书作者在1940年代刚刚开始从事经济学研究的时候,在经济思想史的研究中存在着一种压倒一切的、占支配地位的范式(这种范式在今天虽然仍占有首要地位,但是却不像那个时代那样赤裸裸地毫不掩饰了)。从本质上说,这种范式是将少数大人物描绘成经济思想史的本体,而将亚当·斯密奉为几乎是超人式的奠基者。但是,如果斯密真是经济分析和政治经济学中的自由贸易与自由市场传统的创立者的话,那么对于通常所宣称的他的成就的任何方面提出严肃的质疑就都将是不足道和无聊的了。对于不论是作为经济学家还是作为自由市场的鼓吹者的

斯密的任何尖锐批评看起来都只能被归结为时代错误：由于是从当今超级知识的视角去俯视作为先驱的奠基人，所以渺小的后继者们是在不公正地猛烈攻击着我们正站在其肩膀之上的巨人们。

如果是亚当·斯密创立了经济学，就像从宙斯的额头跃出已经生长成熟并且全副武装的雅典娜一样，那么他的前辈们就必然要成为陪衬，成为不被重视的小人物。从而在这些古典经济思想的人物中，凡是极其倒霉地处于斯密以前时期的人就都受到了漠视。他们一般地被归为两类人，并且都遭到了粗暴的遗弃。直接先于斯密的是重商主义者，他们曾受到斯密的猛烈批判。重商主义者是明显的大笨蛋，他们总是不断地敦促人们积累货币而不要花掉它，或者坚持主张对每个国家来说贸易的余额都必须“平衡”。经院学者被作为热衷于说教的中世纪的不学无术之人，遭到了甚至更加粗野的抛弃，这些人总是喋喋不休地告诫人们注意，“公平”价格必须能够补偿商人的生产成本外加一个合理的利润。

在1930年代和1940年代发表的思想史研究的经典作品，接下来又详细阐述并且在很大程度上是赞美斯密以后的少数顶尖人物。李嘉图使斯密学说系统化了，并且直到1870年代以前始终在经济学中占有支配地位。继而是“边际主义者”，杰文斯、门格尔和瓦尔拉斯，他们通过强调与物品的全部等级相比较而言的边际单位的重要性，按照边际主义方式矫正了斯密—李嘉图的“古典经济学”。随后又到了阿尔弗雷德·马歇尔，他明智地将李嘉图的成本理论与被假定为一边倒的强调需求与效用

的奥地利—杰文斯学说加以整合,创立起现代新古典经济学。卡尔·马克思绝对不会被忽视,他将作为一个离经叛道的李嘉图主义者而在一章中得到讨论。这样一来,历史学家通过处理四、五个大人物(他们当中除了马克思以外,每个人都为经济科学的不间断进步贡献了更多的思想素材)便匆忙讲完了他的故事,这基本上是一个永远向着光明顶点前进和上升的故事。³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年代,凯恩斯当然地被加进这个先贤祠,从而在经济科学的进步与发展史中又增加了新的登峰造极的一章。作为伟大的马歇尔的得意门生,凯恩斯认识到这位老先生由于唯一地强调微观而忽视了他后来所称的“宏观经济学”。因而凯恩斯增添了宏观分析,集中研究和阐释失业问题,而对于这一现象,在凯恩斯以前的每一个人不是不加解释地将其置于经济分析的场景之外,就是通过轻率地“假定充分就业”而习惯地把它遮蔽起来了。

从那时起,这种占支配地位的范式基本上得以持续,虽然近来事情变得相当不妙。一个问题是,这种强调大人物和永远向上发展的历史将要求不断地增添新的最后一章。凯恩斯的《通论》发表于1936年,到现在已有将近60年的历史了,我们能够肯定这期间一定有另一位大人物成为最后一章的主角吗?他可能是谁?熊彼特由于他对于“创新”的现代化的和看起来富有现实意义的强调,曾经在一段时期内领导了潮流,似乎是合适的人选,但是这种想法遭到了破产,这也许是因为人们认识到熊彼特的基本工作(或者“远见”,像他自己富有洞察力地称呼的那样)

早在《通论》出版 20 多年以前就写作完成了。1950 年代以后的时期是含混的,人们很难强行召回一度曾经被遗忘的瓦尔拉斯,来勉强维系经济思想连续进步的统一规则。

我本人关于这种拘泥于少数大人物的研究方法的致命缺陷的观点,极大地受到了两位杰出的思想史学者的著作的影响。一位是我的学位论文的指导教师约瑟夫·道夫曼(Joseph Dorfman),他的无与伦比的关于美国经济思想史的多卷本著作决定性地证明了通常所谓的“小”人物在任何思想观念的发展中将具有多么重要的作用。首先,历史材料由于忽略了这些人而被遗漏了,因而,通过选择和纠缠于少数分散的著作来构造思想史,历史便被歪曲了。其次,众多的被认定为次要人物的人对于思想的发展做出了大量的贡献,这些贡献在某种程度上超过了少数顶尖的思想家。于是,经济思想的重要特征便被忽略了,而所形成的理论也就变得没有价值、贫乏和毫无生气了。

不仅如此,历史本身所包含的短兵相接的搏斗,思想与运动的背景,人们彼此之间如何相互产生影响,以及他们相互之间如何做出反应和对抗,所有这些都必然会为单纯拘泥于少数大人物的研究方法所忽略。昆廷·斯金纳(Quentin Skinner)著名的两卷本的《现代政治思想基础》,使我特别深刻地感受到了历史学者的著作所存在的这种情况,对该书所具有的重要意义即使不采用斯金纳本人的行为主义方法论,也能感受得到。⁴

在我看来(并且对于每一个人来说也将如此),这种强调持续地进步、向前和向上发展的研究方法被托马斯·库恩(Thomas Kuhn)的著名的《科学革命的结构》所摧毁了。⁵ 库恩的注意

力不在经济学上；相反，他按照哲学家和科学史学者的标准方式集中关注像物理学、化学以及天文学这样的必然是“硬”科学的学科。通过将“范式”一词带入知识界的话语中，库恩摧毁了我所喜欢称之为“关于科学史的辉格党理论(Whig theory)”的东西。所谓辉格党理论，正像包括经济学在内的所有科学的思想史研究学者们所认同的那样，指的是科学思想总是在有条不紊地进步，年复一年地发展、筛选并检验理论，从而科学将总是呈现着前进和上升运动，每一年，每十年，或者每一代人，都会学到更多并且拥有更为正确的科学理论。与关于历史的辉格党理论(它是19世纪中叶英格兰的产物，坚持认为事物总是(从而必定)变得越来越好)相类似，关于科学的辉格党历史学者似乎比通常的辉格党历史学者具有更加坚实的基础，他们或者隐含或者明确地断言，在任何特定的科学学科分支中，“后来的总是更好的”。辉格党的历史学者(不论是关于科学史的研究，还是关于本来意义上的历史的研究，都是如此)真诚地主张，对于任何历史时点而言，“已经存在的东西，都是对的”，或者至少要比“先前存在的东西”更好。由此必然导致一种自鸣得意和令人愤怒的潘格罗斯乐观主义(Panglossian optimism)。结果，在经济思想的编史工作中就形成了牢固的(尽管是隐含着的)立场，即认为每一位经济学家，或者至少每一个经济学流派，都为经济思想的这种百折不挠的上升前进运动贡献了他们的一份重要力量。这样一来，能够导致一个经济思想学派整体产生严重缺陷甚至完全失败的总体系统性的错误就不会发生，至于可能使经济学界永久地误入歧途的事情就更不会出现了。

然而,库恩表明,这根本就不是科学发展的方式,由此引起了哲学界的震惊。一旦某个主要的研究范式被选定,就不再有任何的检验和筛选,只有当占支配地位的范式中所出现的一系列失败和异常使科学陷入了一种“危机形势”之后,对其基本假定的检验才会发生。人们无需采取库恩的虚无主义哲学的世界观(他的隐含意思是,没有一个范式是或者可能是比其他任何范式更好的)就能够理解,他关于科学的不那么过于乐观的观点,不论是作为历史还是作为社会学,看起来都是正确的。

但是,如果标准的浪漫主义或潘格罗斯观点甚至在硬科学中也行不通的话,那么就可以确定,它在像经济学这样的“软科学”中,在一个无法通过任何实验来加以检验的学科中,在众多甚至更软的学科诸如必然与人们的经济观紧密纠缠在一起的政治学、宗教以及伦理学的场合,必然也是完全不中用的。

因此,在经济学中不能贸然地假定,后来的思想总是比先前的思想更好,甚或认为所有著名的经济学家都为这一学科的发展贡献了他们实实在在的一份力量。情况极有可能变成,与每个人都为一座永远在不断增高的经济学大厦添砖加瓦不同,经济学可能并且实际上是在争论当中甚至是以锯齿形的方式发展的,后来的系统性谬误有时会排挤掉先前的更为健全的范式,从而将经济思想再引入一种总体上错误的甚或是可悲的路线。在任何给定的时间周期中,经济学发展的总体路线既可能是上升的,也可能是下降的。

近年来,受到形式主义、实证主义和经济计量学的压倒性的影响以及自我标榜是一种硬科学,经济学对于它自己的过去表

现出了极小的兴趣。如同在任何“真正的”科学中那样,人们专注于最新的教科书或者期刊文章,而不再去探究它本身的历史。毕竟,当代的物理学家不会耗费过多的时间去钻研 18 世纪的光学,难道不是这样吗?

然而,在过去的一二十年间,占支配地位的瓦尔拉斯—凯恩斯主义的新古典形式主义范式受到了越来越多的质疑,名副其实的库恩的“危机形势”在经济学的各个领域都出现了,包括对于它的方法论的担忧。处于这种形势当中,对于思想史的研究出现了一种意义重大的复兴,我们希望并预期这种复兴在未来年间将能进一步扩展。⁶ 因为,如果被掩埋在已经丧失的范式中的知识随着时间的流逝可能会消失和被遗忘的话,那么研究较早的经济学家和思想流派就不应该单纯是为了满足文物研究的需要,或者仅仅是为了考察人类的知识活动在过去是如何进行的。先前的经济学家之所以值得研究,是因为他们对于已经被遗忘从而对于今天来说仍然是新知识的东西做出了重要贡献。关于经济学要旨的有价值的真理,不仅可以从最新的期刊中学习到,也可以从已故久远的经济思想家的著作中领悟到。

但是,这些还仅仅是方法论上的一般推广。对我来说,具体地认识到重要的经济知识在时间进程中被遗失这一点,是我注意到 1950 年代和 1960 年代所出现的对于经院学者认识的重大修正开始的。这种开创性修正引人注目地出现在熊彼特的巨著《经济分析史》中,并在雷蒙德·德·罗弗(Raymond de Roover)、玛乔丽·格赖斯—哈钦森(Marjorie Grice-Hutchinson)和

约翰·T·努南(John T. Noonan)的著作中得到了发展。结果表明,经院学者并不简单地属于“中世纪”,而是始于13世纪,随后直到16世纪处于扩展和繁荣的时期,并且延续到了17世纪。经院学者远不是生产成本的道德说教者,他们相信公平价格就是在自由市场上基于“共同估价”而建立起来的价格。不仅如此,经院学者绝非是天真的劳动或生产成本价值理论家,他们可以被视为“原初的奥地利学者”(proto-Austrians),拥有复杂老道的关于价值与价格的主观效用理论。进一步地说,某些经院学者在发展一种“原初的奥地利式的”动态企业家理论方面,已经远远超出了当前追求形式主义的微观经济学。此外,在“宏观”方面,从比里当(Buridan)开始到达到顶峰的16世纪西班牙经院学者为止,经院学者们研究出了一种“奥地利式的”而不是货币主义的有关货币和价格的供求理论,包括区域间的货币流动,甚至还有一种关于汇率的购买力平价理论。

这种对我们关于经院学者的知识的令人瞩目的修正,是在拉丁语上造诣较深的从欧洲训练出来的经济学家带给美国经济学家的,这看起来不是偶然的,美国学者的拉丁语知识程度普遍令人不敢恭维,而拉丁语正是经院学者写作时使用的语言。这一简单事实突出了现代世界中知识丢失的另一个原因:即在人们的本国语言中所表现出来的封闭性(这在说英语的国家中尤其严重),这种封闭性自从16世纪欧洲基督教改革运动以来,造成了学者们曾经达到过的在全欧洲范围的联系的中断。如果人们要问:为什么欧洲大陆的经济思想经常只能在英国和美国产生最低限度的或者至少是迟延的影响,那么一个简单的

原因就在于,这些著作尚未被译成英语。⁷

在我看来,关于经院学者的修正主义所带来的影响,就在这两个十年间又为德国裔的“奥地利学派”历史学者埃米尔·考德(Emil Kauder)所补充和加强了。考德揭示出,在17世纪、特别是18世纪的法国和意大利,占统治地位的经济思想也是“原初的奥地利式的”,它强调主观效用和相对稀缺性是价值的决定因素。然而,以此为基础,直接基于他自己的著作和那些对经院学者的传统解释加以修正的著作,考德又继续就亚当·斯密的作用问题提出了一个令人吃惊的见解,这个见解认为,斯密远不是经济学的奠基人,真实的情况正好相反。就相反的情况而言,斯密实际上是拿走了完好的、几乎发展成熟的原初的奥地利的主观价值传统,并悲剧性地将经济学导向一条错误的路线上,一个死胡同,以至于一个世纪以后奥地利学派不得不从这里开始来拯救经济学。斯密不去研究主观价值、企业家,以及关注真实市场定价和市场活动,他将所有这些都加以抛弃,而代之以一种劳动价值理论和一种对于不变的长期“自然价格”均衡的突出关注,该均衡是一个假定不存在企业家的世界。到了李嘉图那里,这种不幸的研究焦点转移又被进一步增强和系统化了。

如果斯密不是经济理论的创立者,那么他也就不是政治经济学中的自由放任学说的奠基人。不仅经院学者既是自由市场的分析家和信仰者,也是政府干预的批判者,18世纪法国和意大利的经济学家甚至具有比斯密更加自由放任的倾向。斯密对于杜尔阁和其他人(杜尔阁是一个几乎纯粹的自由放任的拥护

者)所阐述过的东西,只是添加了诸多胡说和限制条件。结果表明,斯密并不是应当被尊为现代经济学或自由放任学说创立者的某个人,而是更接近于保罗·道格拉斯在1926年芝加哥纪念《国富论》时所描绘的形象:卡尔·马克思的一位必要的前辈。

埃米尔·考德的贡献不仅限于他将亚当·斯密描绘成先前的经济理论的优良传统的破坏者,和在库恩式的锯齿形经济思想图景中一个巨大“倒退”的开创者。除此之外,考德对导致不同国家经济思想发展过程中的那种令人困惑的非对称性的基本原因的判断,也是引人入胜的,只是它更富有推测的色彩。例如,为什么主观的效用理论传统繁荣于欧洲大陆,特别是法国和意大利,继而又特别地复兴于奥地利,而劳动和生产成本理论则专门在大不列颠发展起来?考德将这种差别归结为宗教的深厚影响:经院学者,以及那时的法国、意大利都属于天主教国家,而天主教教义强调,消费是生产的目标,消费者效用和享乐至少在适中程度上属于有价值的活动与目标。相反,英国的传统,从斯密本身开始就是加尔文教派,它反映了加尔文教所着重强调的思想:努力工作和辛苦劳累不仅是好事,而且是一件天大的好事,而消费者享乐充其量也只能属于一种不得已的邪恶,一种促使劳动和生产连续进行的必要条件。

在阅读考德著作的时候,我认为这个观点是一种挑战性的见解,不过它基本上属于一种未加证明的推测。然而,当我继续研究经济思想并且着手撰写这几卷书时,我得出的结论是,考德的观点已经得到了反复多次的证实。尽管斯密只是一位“温和

的”加尔文教徒,他却是一个坚定的人,我由此得到了这样的结论:加尔文教所强调主张的东西可以解释斯密的思想特点,例如,斯密对于高利贷法的拥护(如果不这样来解释,斯密的这种拥护将是令人迷惑不解的),以及他的研究重点为何从作为价值决定因素的反复无常且喜欢奢侈的消费者那里,转移到将其辛苦劳作的工时嵌入其物质产品价值中去的有德行的劳动者身上。

但是,假如斯密可以由加尔文教来解释,那么作为西班牙—葡萄牙后裔、从犹太教转为贵格教(Jew-turned-Quaker)的大卫·李嘉图,一个肯定不是加尔文教徒的人,对他又如何来解释呢?在我看来,最近关于詹姆斯·穆勒作为李嘉图的指导老师和“李嘉图体系”的主要奠基人所具有的支配性作用的研究,在这里可以强有力地派上用场。因为穆勒是一个被委任为长老会牧师的苏格兰人,并且深受加尔文教的浸染。在他人生的晚期,穆勒来到了伦敦,并且成为一个不可知论者,可是这一事实丝毫没有影响到穆勒关于人生和世界的基本态度所具有的加尔文教派的特性。穆勒所拥有的巨大的福音派传教士的能量,他对社会改良坚持不懈的努力,以及他对于辛勤劳动(此外还有同属于加尔文教义的节俭美德)的忠诚和热爱,都反映了他终其一生的加尔文教的世界观。约翰·斯图雅特·穆勒对李嘉图主义的复兴,可以被解释成他为了纪念对他有深远影响的父亲而做出的一种祖先崇拜式的(fileopietist)奉献。阿尔弗雷德·马歇尔将被他变得庸俗化的奥地利学派的洞见纳入到他自己的新李嘉图主义的大纲,也是来源于一种高度说教的、福音派教会式

的新加尔文主义的影响。

相反,作为对斯密—李嘉图思想的主要挑战者,奥地利学派兴起于一个不仅拥有牢固的天主教而且其人民的价值和态度仍然深受亚里士多德和托马斯主义思想影响的国家,也是绝非偶然的。奥地利学派的德国前辈们所繁荣发展的地方,不是在奉行新教和反对天主教的普鲁士,而是在德国那些或者奉行天主教或者在政治上与奥地利而不是与普鲁士结盟的州。

这些研究使我日益坚信,如果撇开宗教世界观以及社会和政治哲学,将会灾难性地歪曲任何经济思想史的面貌。这一点对于19世纪以前的各个世纪是相当明显的,就是对于19世纪来说它也是正确的,尽管这时技术的装置更多地拥有了其自身的独立性。

正是由于这些见解,本书的各卷与通常的标准和规模完全不同,这不仅仅在于它提供了一种奥地利的、而不是新古典或制度主义的视角。此外,本书的整个部头也比大多数同类书籍大出许多,因为它坚持把所有的“次要”人物以及他们的相互作用都纳入进来,不仅如此,除了他们比较狭窄的、严格意义上的“经济”观点以外,还要强调他们的宗教和社会哲学的重要性。但是我希望,篇幅的延长以及将其他因素囊括进来,将不会降低本书的可读性。相反,历史必然意味着对于真实人物以及他们的抽象理论的叙事式讨论,包括胜利的喜悦、不幸的悲剧以及冲突,这些冲突常常既是道德方面的,也是纯理论方面的。因此,我希望,对读者来说,这种令人不惯的篇幅延长将由于本书包含

了远比通常的经济思想史著作内容丰富得多的人类戏剧性事件,而得到补偿。

默瑞·N. 罗斯巴德

于内华达州,拉斯维加斯

注释

- 1 约瑟夫·熊彼特的拥有巨大价值的、不朽的《经济分析史》(纽约:牛津大学出版社,1954年)有时被称为是“奥地利式的”。可是,虽然熊彼特出生于奥地利,并且在伟大的奥地利学者庞巴维克的指导下从事研究,他本人却是瓦尔拉斯学说的忠实信奉者。此外,他的《经济分析史》还具有折中性和个人气质特征性。
- 2 关于当前的三个主要的奥地利范式的解释,可以参见默瑞·N. 罗斯巴德的《奥地利经济学的当前状态》(*The Present State of Austrian Economics*)(阿拉巴马州,奥本:路德维希·冯·米塞斯研究所,1992年)。
- 3 本书作者在哥伦比亚大学准备其博士论文答辩时,曾请德高望重的约翰·莫里斯·克拉克作为经济思想史方面的审阅人。当本书作者询问克拉克是否应当阅读杰文斯的著作时,克拉克令人有些吃惊地回答道:“这有什么意义呢?杰文斯著作中的有价值的内容全都包含在了马歇尔的著作中。”
- 4 约瑟夫·道夫曼,《美国文明中的经济思想》(*The Economic Mind in American Civilization*)(五卷本,纽约:维金出版社(Viking Press),1946—1959年);昆廷·斯金纳,《现代政治思想的基础》(*The Foundations of Modern Political Thought*)(二卷本,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1978年)。
- 5 托马斯·S. 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1962年,第2版,芝加哥: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70年)。
- 6 近年来专心致力于对完全依赖于陈旧过时的19世纪中叶力学的新古典形式主义进行卓越而有力的批判这样一种努力,成为这种最近的态度。

14 古典经济学——奥地利学派视角下的经济思想史

度转变中一个值得欢迎的信号。参见菲利普·米罗斯基(Philip Mirowski),《比光还热》(*More Heat than Light*)(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1989年)。

- 7 在当前的时代,当英语变成了欧洲的通用语言,并且大多数的欧洲杂志都是用英语发表文章以后,这一壁垒已经减少到了最低限度。